

当下大众文学的成功实践

——评新市井小说《今夜月未央》

□沈荣均

神和审美深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小说的人设运营。孙向东的形象尤为丰满立体。这位曾经的高校数学教授,退休以后自己撕下了光鲜的外衣,抱着重新活一回的苟且法则,干了些遭人弹拨的事情,完全与曾经的模样判若二人。易天雄倒是表里如一,这得力于他曾经的从武职业背景。但是作家并未将其脸谱化,而是放下孔武有力的身架子,蹲下来,赋予其温柔可开的一面,让自由的怀柔与力量和规范形成形象对比。舒中胜是个曾经沧海,见过世面的大老板。商人履历,塑造了商人的个性,谨慎,自私,好面子。作为所谓成功人士的代表,舒中胜的道德,在妻子胡丽萍拯救女儿生命过程中,既是接受教育的一方,也是自我救赎的悲剧审美过程。这种将日常博弈升华为精神修炼的独特方式,正是作家对老年人晚年审美情趣的深刻洞察——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融合了职业背景、人生经验与豁达态度的生活美学,在平凡琐碎中提炼精神的愉悦与尊严的维系。岁月磨平了他们的棱角,但麻将桌又重塑了他们返老还童的人格过程。他们集体为这部“微观江湖”注入了不可或缺原始生命力与江湖侠气,共同构成了银发世界丰富的精神光谱。他们的晚年的鸡零狗碎,无声地表达着这群城市老人的集体诉求:即使在暮年,也拒绝完全被“理性”或“体面”规训,依然渴望在有限的天地里释放生命的小激情、捍卫心中的小天地。

由此看来,《今夜月未央》撑起新大众文学的成功试验。它将独特的麻将文化,这一极具烟火气的市井符号,成功提炼并激活。“在喧嚣中守静,于博弈中悟道”,为传统文化符号注入了在隔代语境中流通的生命力。尤为可贵的是,在流量至上、碎片阅读盛行的短视频时代,作品旗帜鲜明地表达慢慢活着、好好享受的,朴素的余生理想。牌桌上连篇累牍的心理博弈描写,如同金庸笔下高手内力比拼的当代回响,倒逼读者在延迟满足中,细细品味那份深水静流的人生禅意,完成了一次对速食文化的温和而坚定的美学反驳。

四川作家章勇的长篇小说《今夜月未央》,今年四月问世以来,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捧读喜爱。小说以退休老人的麻将桌为舞台,将市井烟火淬炼成一部充满现代性隐喻的“微观江湖”传奇。小说以新大众文艺的叙事策略,重构了“江湖”的当代内涵——它不在深山古刹,在邻里牌桌之上;其刀光非兵刃相击,而是灵魂与岁月、欲望与豁达的无声博弈。小说巧妙地将麻将升华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生哲学,并在喧嚣的四人博弈中探寻静水深流的人生禅意,于彼此间揣摩命运的涨落无常,堪称一部聚焦银发族日常审美的“新市井小说”。

小说塑造了以媒体人章露华为代表的银发一族,他们在牌桌的方寸战场和家庭的情感纠葛中,重新锚定自我价值,完成了集体的身份重构。这样聚焦民间日常的叙事逻辑,呼应了新大众文学对“边缘者”的偏爱。作家以虚实相间的笔法,将养老困境、代际隔阂等社会痛点,转化为江湖恩怨般的呈现。老伴们的日常唠叨被赋予了“绵里藏针”的暗器特质,子女们的疏远被喻为难以逾越的“门派隔阂”,这种巧妙的转化不仅将一些较为沉重的主题作轻盈的审美升华,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老年人精神处境细致入微的关怀——关注他们如何在琐碎与冲突中,依然努力维系生活的体面与内心的丰盈,这正是晚年审美情趣得以生发的土壤。

作品的核心魅力在于其将麻将技艺演绎为精妙的人生算法。每一局博弈都如同“随机行走”,角色们如郭靖般被命运洪流推搡,却又在牌理的精研中参悟“涨落一耗散定理”的隐喻——通过控制情绪的剧烈“涨落”来减少生命能量的无谓“耗散”,最终达到张三丰式“以柔克刚”的圆融境界。胡牌时的静默克制与败局后的豁达释然,恰似武林高手的收放自如,牌桌俨然成为映照世情的道场。这种代际碰撞尤为鲜明,老一辈的“扯麻经”的躺平日常,跟年轻一代的创业激流形成鲜明对撞。他们在牌桌上的隐忍与周旋,暗合以退为进的古老智慧,展现了一种厚积薄发的生存魅力。他们在经历人世艰辛,商海沉浮中,积累的各种“活法”,如同现代版的武林招式,到了退居二线的麻局江湖中,又忽然明白了什么。这种对“江湖”符号的创造性转译,正是新大众文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活化运用,也是对明清以来市井小说的深刻开拓——它不再局限于描绘底层生活的艰辛或奇闻异事,而是将日常的、地域性的包括麻将将在内的生动有趣的市井活动,提升为承载复杂人性、时代变迁和哲学思考的宏大叙事场域,赋予其崭新的时代精

新时代乡土文明的精神灯塔

——贺享雍长篇小说《小镇灯塔》的解读

□冯源

对于乡土的书写,既是文学重要的审美范式之一,又是四川文学一直葆有的优秀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有李劫人、沙汀、艾芜、林如稷等在乡土小说创作领域异军突起。这些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幽默笔调,力显出四川乡土小说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堪称现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

自进入当代文学以来,则有更多四川作家涉足这一题材领域的小说创作,尤以周克芹、傅恒、李一清、阿来、贺享雍、罗伟章等为代表。贺享雍于2020年出版的十卷本《乡村志》,以川东北贺家湾为聚焦对象,着力于描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出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层表述,展示出作家对乡土文明的真诚守望,具有独特的思想蕴含和审美意义。

《小镇灯塔》是对这一优秀传统与审美范式的延续和深化。小说主要以范戈这个典型人物为中心,讲述他在故乡小镇开办书店的一段曲折经历,以唤起人们对书的阅读、对知识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进而希望改变乡土贫乏精神世界的现状。

作为省城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头儿的范戈,应邀出席在故乡小镇举行的乡友创业座谈会。在会上,范戈抛出了自己的投资计划——在小镇开办一家书店,在范戈看来,如今的小镇虽物资本

活条件大幅度提升,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仍寡味无趣,不是聚在一起打通宵麻将,就是一个劲儿地吃喝玩乐,或者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他意图改变这一社会现状,计划开办一家书店,以丰富人们的内心生活与精神世界,更何况福镇还一直享有“人文蔚起、文风鼎盛”的优良传统和赞誉。

然而,范戈的这一真诚期许和美好祝愿,在现实生活中却遭遇了一系列波折和坎坷。座谈会上,山西做矿产生意的黄总、海口房地产的曹总、浙江现代农业科技的吴总、广州做新材料的汪总等人,动辄拿出几十个亿的资金,投入小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引发了会上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掌声。待到范戈说出了自己的投资计划——在福镇开办一家书店,“不但看见镇上头头脑脑脸上的表情突然像木偶似的僵硬起来,就是先前发言的黄总、曹总、吴总、汪总和还没有发言的其他老总,都像听错了一样瞪大眼睛盯着他。”令范戈备受冷遇和嘲讽。尽管如此,范戈仍然不管不顾地创办了福镇第一家书店,并取名为“春之光”,意即书籍如春光一样沐浴人的精神。令范戈没有想到的是,自书店创办以来,便陷入了一系列困境,先是侄女杨媛媛禁不住喧嚣世界的引诱,选择默默离开,接着又发生张学安持刀闯入书店的恶性事件,不仅使书店形象严重受损,而且还惹上一场小小的官司。即便是范戈

的红颜知己金珏来到书店,想尽了各种办法,也同样遭遇了福镇李公子的骚扰和在经营上难以为继的困境,最终不得不关闭书店,神情落寞地回到省城。

范戈之所以要开这家书店,一是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力图用开书店的形式来丰富人们的闲余生活和精神世界,以改变福镇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弊端;二是深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祖辈起范家就是福镇的书香世家。小说运用大量的笔墨,细腻描写了主人公对祖辈父辈所历经的往事的追忆和缅怀,再现了一幅幅随时代变化的历史图景。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中,既有祖辈们为了达成求学和印制书籍的愿望,又有父辈们为了保护祖辈留下的书籍,与落后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也有孙辈们为了继承祖辈父辈的遗志,全然沉浸于浩瀚书海的细致描写,更有小镇人为了重建“人文蔚起、文风鼎盛”的人文精神,默默付出巨大努力的深度表达。在这一幅幅历史场景和一个个历史细节的描写中,不仅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化青年形象,而且饱含着作者的情愫、内心、思想,更是对小镇精神形象的有力彰显。

从另一种角度看,范戈在故乡福镇开的这家书店,也并非一点成效都没有,它至少影响了两个人的命运和人生,一个是年轻人伍浩,一个是中年妇女王明玉。前者本是一个打工仔,但通过自

身的勤奋努力,特别是在书店一段时间的居住,和通过对大量书籍的阅读,考上了省城一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重回福镇担任镇长助理,由此开始了这个青年的别样人生;后者则通过书的浸润和滋养,成为全省的一位知名作家,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赌王与新生》。这两个人命运之所以改变,无不是受到了书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衡量一部小说的价值,既可以从思想意蕴方面进行审视,也可以从艺术特质方面予以考量。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传递出了深度意义的思想蕴含。它以川东北一个普通小镇的社会发展为主要观照对象,通过对一名文化青年在故乡开书店的亲身经历,真实描绘了这家书店由辛苦草创到陷入经营困境再到最后不得不歇业的整个过程,不仅表达出在偏僻小镇开展用知识武装人的大脑、用书香浸润人的心灵世界的极其不易,同时预示着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乡土文明建设,仍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充分凸显书籍或知识对于人类世界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这部小说之所以把书店象征为精神灯塔,旨在对乡镇这种基层社会展开更具力度和深度的文化建设,这是当代乡土社会真正欠缺的根本所在。也再度确证,作者是一个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有着深层问题意识的作家。

时代洪流下的人性幽光

——评刘楚昕长篇小说《泥潭》

□彭定旺

《泥潭》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背景,以荆州地域为舞台,再现了时代的风云气象和世俗图景。武昌起义是近现代革命的开端,其间有许多风谲云诡,峰回路转的大事件,有许多功若丘山,咬钉嚼铁的大人物,刘楚昕打破常态和秩序,没有去展现波澜壮阔的宏大场景和史诗般的历史脉络,而是在《泥潭》的开篇,即让小人物的亡灵成为主角,絮语交织,悲切凄冷。整部小说描绘了一众小人物在历史缝隙和社会激变中奔突、挣扎、纠葛、迷茫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给人独树一帜之感,其非线性叙事方法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先锋意识和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文学感觉,令人耳目一新。

一、叙事结构与多重视角

《泥潭》的叙事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旗人前军官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和神父马修德为主线。第一部分采用亡灵恒丰第一人称的多头叙事,现实与梦境重叠,超我与亡灵交汇,潜意识与多重人格意识闪回的手法,展现其家族悲剧和死亡结局;第二部分以第三人称聚焦革命党人关仲卿的革命活动,以现实主义笔触刻画其复杂性格和心理状态;第三部分转换成神父马修德的第一人称,以他的日记和楚卿的书信为载体,回溯人物命运,填补叙事空白,使恒好、关仲卿、楚卿、熊丑等一千人物形象在命运延展中得以完整和丰满。三部分既独立成章,又相

互印证,虽然人物主角及叙事方法各不相同,但在读完全篇之后,你会感受到它们的内在相关和气息相通,你才会明白人物之间的关联,才能把三部分的碎片连成整体,拼凑出一幅完整图景,人物形象也得以更加完整和丰满,从而产生“原来如此”的感觉。

小说大量运用意识流、闪回和“超我”对话等现代主义技巧。例如,“我看见我……”的多重自我叙述,既增强了文本的虚幻感,又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矛盾。多重视角中死亡和逃离是唯一贯穿全篇的。左都统恒龄穿胸自杀,留学生沉海自尽,恒丰、恒好、端瑞、乌端、马修德等人死于非命,关仲卿、楚卿等人的逃亡,不仅是命运发展和人物结局需要,更承载着深刻的文学寓意——旧秩序的瓦解、新势力的迷茫,以及个体在时代裹挟下的渺小和无助。

二、小人物视角与非英雄化书写

《泥潭》刻意避开宏大历史叙事,采取非英雄化书写,聚焦于社会边缘人物。三个部分的主角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上都不是重要人物,即使关仲卿卧底清廷得到清都统的重用,在革命党夺取荆州城后,他成了善后司司长,同黎元洪总统、黄兴等革命领袖同场开会,并上了袁总统的首义功勋名单,多少也算个人物,但作者从不往高处大处去写,而是往细处小处落笔。在他的日常里写出他的心思缜密,体弱多病,

知深浅懂利害,信念坚定,既有杀伐之心又有清雅作派,作为候补道和善后司长,不同流合污去贪占田产和钱财,不与恶势力结盟去做省议员;写黎元洪黄兴之类的大佬,也是三言两语去写他们的平庸和鲁莽,而不写他们作为大人物的异象和特质。不渲染不营造不铺设不议论,不搞情节发展和草蛇灰线,也没有高潮迭起和延宕起伏,只有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只保留小说核心要素——冲突和细节,便足以让读者感受到时代气息和内心情状,使人物充满分量。

对习惯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第二部分是最无阅读障碍的,它把第一部分中不曾引人注意的一个人物——关仲卿写成了这一部分的主要人物,而且成了全书体量最重的部分。三部分的叙事手法无论如何变幻,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描绘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气息却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对善良与卑劣,懦弱与反抗,失落与希望,挣扎与自救等心理活动的表达,充满了洞察力、人情味和感染力,睿智而深刻。在历史洪流与个体生命、生存与死亡、真相和诡异、罪恶与救赎的哲学思考中,作者通过对小人物的形象塑造,展现了彼一时期的社会冲突、民族冲突、阶层冲突,描绘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生命本质和人性幽光。

三、语言的干净和文本的纯粹

在网络盛行粗话脏话大行其道的当下,《泥潭》语言的干净到了令

人咋舌的地步。全篇没有出现一句粗话,一个脏字,哪怕十分符合人物形象的一个脏字眼,作者都必须用方框“□”空出来,这与贾平凹在《废都》中使用“□”并标明此处省去多少字的猎奇手法截然不同,这种“语言洁癖”既维护了文学的严肃性,也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品格的坚守;另一层“干净”的意思是语言的规范简洁,词汇丰富,句式轻盈,表达准确,没有混乱和琐碎的感觉;他不讨好读者不讨好编辑的叙事方式,使文本十分纯粹。据说《泥潭》原本50万字,作者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否定中修改,这才成了如今的17万字,如果不是出版社合同时间限制,恐怕他还要修改下去。作者对精简与修改的极致追求,以近乎苛刻的态度打磨语言,去冗余、留精髓,只保留了小说核心要素,使小说语言简洁而富有张力,使小说文本更加澄明和纯粹。

四、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

小说以荆州为地理坐标,虚实结合地呈现出荆州背景。《泥潭》中的荆州似乎仅指城池所在地,而非所辖疆域之地。承天寺、玄妙观、关帝庙、便河桥、天主教堂、洋码头、公安、草市这些城市地标和毗邻之地在小说中一次次出现,作者却又不片刻驻足于风物景致,风土人情,更不屑于源远流长。这种“不屑于流俗”的写法虽显遗憾,却符合作者聚焦人性而非地域的创作意图,却又十分合理。

荆州之地遍布水域,沙市依码头而生,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讯息交汇,物阜民丰,形成了沙市人守土重迁的思想和自满精致的习性。小说中关仲卿是沙市人,他的身上除了旧文人的共性外,也不难看出沙市人的脾性。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沙市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开发的码头文化,应该具有丰富的文学底料。《泥潭》每次写到关仲卿回到沙市,却从不写他在沙市落脚何处,或许关的居所与戏剧大师余上沅(沙市人,应与小说人物关仲卿同龄)的宅院相邻,再或许他们还是童年玩伴。不多纠缠,带一笔如何?既增加了历史感和人物底蕴,又不影响文本风格,何乐而不为?

《泥潭》在方言使用时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粗略印象中,只使用了三个词:老巴子(老妇人)、奶巴子(婴儿)、裹人(说话纠缠不清,反反复复)。沙市自古以来就是荆楚文化的中心,积累了上千年历史的流风余韵,其独特的方言俚语,肇于远古,传承至今,许多惯常使用的词语,其实衍生于古代的文言文,在小说中适当使用并不影响文本的纯净和品格,相反可以增加人物的质感和鲜活,大可不必讳莫如深。

刘楚昕的小说《泥潭》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洞察力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其文学手法、艺术特点及主题深刻性值得后面再作深入探讨。

本版责编:张语婷